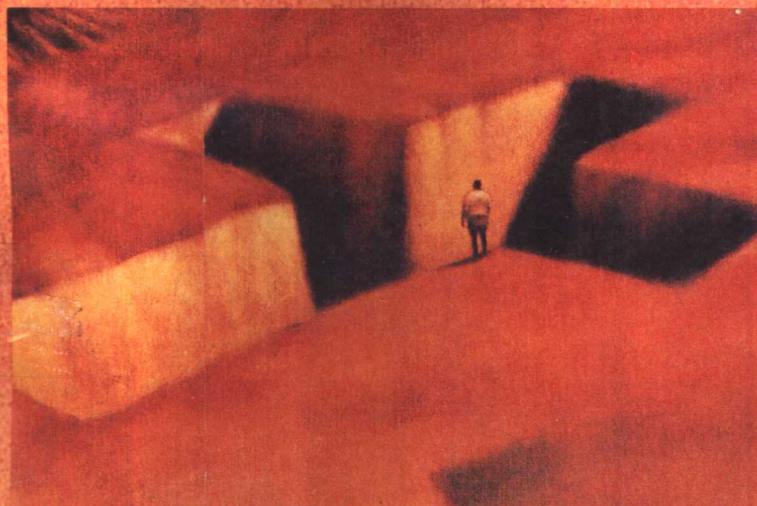


石
磅
著

新世纪儿的

行世录



春风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儿的忏悔

忏悔

辽新登字 3 号

新世纪儿的忏悔

Xin shi ji er de chan hui

石 磅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保定市满城平原印刷厂

字数: 20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责任编辑: 赵威重

封面设计: 文 等

责任校对: 李 明

ISBN7-5313-1441-X/I·1275

定 价: 9.90 元

· 石磅独白：

《新世纪儿的忏悔》这部书稿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界定，它既不是一部纯文学作品，更不是一本传奇小说，甚至都不能称其为一本书。它只是一个人从幼童到成年所留下的人生印迹的记录，一份心灵的自白。

在提起笨拙的钝笔来记录它的时候，我已经历了几番灵魂的炼狱。

此刻，我已耗尽了真诚和勇气，将自己的躯体作为牲灵奉献在良知的祭坛上！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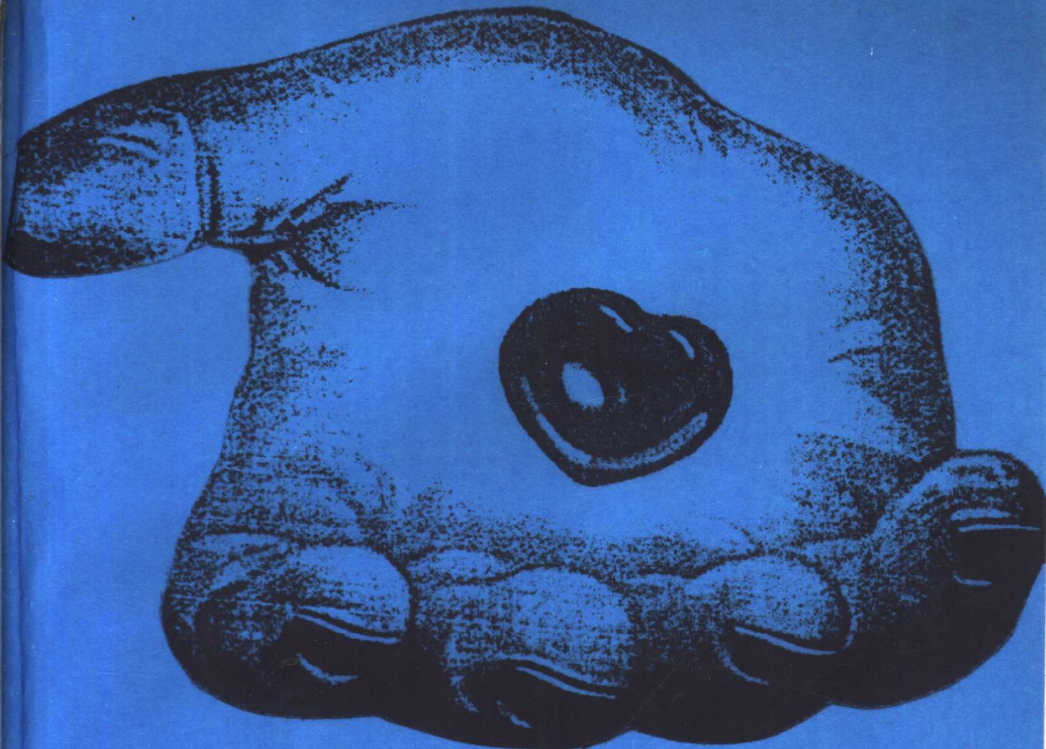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是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

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让——雅克·卢梭

卢梭老先生，我——一个晚于您二百三十八年出生的后辈，今天敢于站在上帝的面前对他说：“我比这个人好！”

老先生，您确是我最佩服的伟大作家，您的《忏悔录》我不知看了多少遍，真是一本“既无先例”的书，但您说“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就太绝对和武断了！——此刻，我作为一个晚生后辈就要向您这位先哲和大师挑战！——您是在去世后让朋友把这本“既无先例”的书稿公之于世的；而我却要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有生之年，把我的善良、忠厚、坦诚、质朴与卑鄙、丑陋、怯懦、自私、下流、肮脏、吝啬……统统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并且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大地，而不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本土。美就是美，丑就是丑，但是“亮丑”却并不丑，甚至是一种美！豁出一个自我，解剖一个时代——我正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剥得精光，就像一头赤身裸体的牲灵，在无人押解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一步步沉稳地向祭坛走去，将自己的头颅放到那刀斧高悬的砧板之上——我冒着众叛亲离、妻离子散、抑或对簿公堂的风险，紧握朴拙的钝笔，写下这多余的一篇——《新世纪儿的忏悔》。



石磅著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22188



美就是美丑就是丑
但“亮丑”却并不丑甚至是一种美
豁出一个自我
解剖一个时代——

“妈，我走了，您多保重！”参加完父亲的葬礼，我要登车从长春返回天津了。我轻声地对继母说。

“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你妈在天津。我是你情妇！是你的老媳妇！”继母瞪着通红的眼睛冲着客厅里披着黑纱的父亲遗像吼着，“如今你爸死了，我更敢堂堂正正地说了！”

我顿时觉得所有来奔丧的亲友们把目光全集注到了我身上，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好像扎进了一根尖锐的刺刺。

“妈，你别喊了，这多难为情……”

“啊，这会儿你知道难为情了？！当初你干什么了？”继母不依不饶地拽过来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小凌宇，他不是你哥。记住——他才是你爸爸！”

“妈……”我委屈得带出了哭腔，“我才比她大八岁呀！我那会儿哪能生……哪会……呀？！”

继母按着妹妹的脖颈非让她给我磕头认父不可。我吓得一个劲儿地往后退，“小妹儿，别……别这样！我不是……”

“扑通！——”我从火车的卧铺上掉了下来。好在我睡的是下铺，摔得还不太重。

我从毛毯里伸出胳膊，支撑起身子爬上了卧铺。

车窗外是一片灰蒙蒙的雪野，天刚微微发亮，车厢里的旅客还都在沉睡之中。

我掀掉了身上裹着的毛毯，挪动了一下穿着棉衣棉裤的身躯，这时才感到小腹涨得好难受。我起身穿上棉鞋，朝车厢一端的厕所走去。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刚才陷入的梦境就是此次出关奔丧脑海中反复出现的荒诞场面。梦魇的余悸仍滞留在心间，为了分散思绪我从旅行袋中拿出了两本书：《中国电影家列传》和《中国现代作家传略》。

借助昏暗的晨光，我把它们分别翻到了与我有关两个人的篇目上——

胡苏，原名谢相箴，电影剧作家。1915年农历十月初三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的一个城市贫民家中。1934年在宁波组织了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时代剧社，任理事、社长。先后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回声》等抗日话剧。1937年10月入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并留教，从此开始了创作生涯。先后创作了《堤》、《三丫头》、《自己的书》等多幕和独幕剧三十多个。1951年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6年调至长春电影制片厂。胡苏创作、改编并已拍成影片的电影文学剧本有：《女社长》（1958年与方荧合作）、《红旗谱》（1958年）、《换了人间》（1959年与吴天、王滨合作）、《万木春》（1959年与潘青合作）、《北斗》（上下集1979年）。胡苏现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编剧。此外，还担任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及中国戏剧家协会吉林分会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省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

——这就是我字面上的、社会意义上的生身父亲。他早

已怀疑我不是他的血缘，几年前便不再承认我这个儿子，并且用书信通告和遗嘱的形式将我开除出了谢家。此时的葬讯是姐姐电告我的——死皮赖脸地奔丧来了！

柳溪（自传）：我本名纪清旸，一九二四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生于天津，原籍河北省献县崔尔庄。是清朝主编过四库全书、写过《阅微草堂笔记》的纪昀（纪晓岚）的六世孙。芦沟桥事变发生，天津大乱。我考入了保定女师。从这时起，我学着写小说，并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上到初中二年级，又经老师补习功课，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那时，我十六周岁，是全校最小的一名大学生。

一九四二年，我因为参加了砸饭厅的学潮而被列入了通缉的黑名单。幸好我的历史教授李荃侓着告诉了我被通缉的消息，我便逃走了，因而未能在该校毕业。

一九四三年冬，通过我的亲属，接近了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地下党的同志，并加入了外围工作。其后，我就在一种公开的职业身份掩护下，在党的城工部的领导下进行秘密工作。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因暴露目标，撤离国统区，到冀中解放区。我先后在《冀中导报》当编辑、冀中军区司令部当秘书，也做过抗战的中学教员、剧社演员。一九四九年三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描写农村的第一篇小说《挑对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从此开始了我的业余写作。一九四九年调到河北省文联筹办创刊《河北文艺》，以后我就在编辑部工作，由编辑，小说组长，直到担任编辑部副部长。一九四九年十月发表了小说《刘寡妇结婚》，获得河北省一九五〇年作品评奖小说甲等奖。一九五二年，调中央文化部电影

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与杨沫、颜一烟合作完成了影片《五支歌》。这一时期我写的特写《爬在旗杆上的人》，收在中国作家协会编辑的《特写选》中。一九五七年，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搞专业写作。我前后出过两个短篇小说集——《挑对象》（大众书店）、《爬在旗杆上的人》（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关于写作的小册子——《试谈写小说》（东北新华书店）。一九七八年八月开始重新发表作品，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生涯》、《柳溪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功与罪》、《燕子李三传奇》等，计约二百万字左右。

——这就是我的生身母亲。但是，人为地隔绝了三十年，至今相聚才半年之久。

卧铺对面的那一溜灰蒙蒙的车窗像连缀起来的活动画幅，描摹出窗外肃杀阴冷的冬日景色。它们就像一本被翻阅的连环画一样，唤醒了我儿时的记忆——第一次从北京出发乘坐这趟列车的情景。

隆隆作响的车轮碾碎了现实，载来了回忆——

我生于1950年这个“虎年”的农历五月十五日。生下来整整10磅重，因此乳名就叫十磅，大号谢午元。按老百姓的说道：男孩占“五”好。我的生辰里占了两个“五”，所以老太太们说这小子命好，掉到福窝里了。

1956年初的一天，刚刚五岁半的我懵懵懂懂地被一辆小轿车拉到了北京前门火车站，要与爷爷和父亲一道去东北了。母亲也乘同一辆轿车到车站来送行。当时我这个鸿蒙未开的顽童并不知道也不可能懂得父母已经离婚家庭宣告解体，还傻呵呵地挺高兴——啊，要坐大火车喽！到冰天雪地的“东

北”可以滑冰、堆大雪人儿，坐爬犁……森林里还有好多的野兽：大老虎，大狗熊、狐狸、狼……大人们给我描绘的好一派乐园景象！我这颗童心完全陶醉在这美好的憧憬之中了。

眼前这乌黑锃亮的铁道就是我人生的轨迹，载着我这个具有四分之一满族血统的“混血儿”驶向那祖先的发祥地，并滞留在白山黑水之间整整三十年，在人生的旅途上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印迹。

火车停在了长春站。

我这个五岁半的幼童眼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大的雪，在站台上刺眼的灯光下显得阴森可怖。

每一个走出车厢的人嘴巴前面都好像吹着一团丝丝缕缕的棉絮。我随着爷爷和父亲通过了出站口，一种从未听到过的口音萦绕在耳边了。从首都来到这里好像到了一个十分落后的角落——一个个卖冻柿子、冻梨、烧鸡、薰鸡蛋、五香干豆腐的小摊床前，都悬挂着我从未见过的一种小灯，后来我才听说叫“嘎斯”灯。单头或是双头的火光照在小贩的蓬松、厚实的狐皮、狗皮帽子上。我感到仿佛走进了另一个国度。

长影没来人接站。爷爷、爸爸和我晾在了车站前的冰雪广场上。爷爷戴着一顶南方的棉帽，黑灰色的灯芯绒面上积着油垢，此时已挂上了一层白霜，小小的帽耳朵将将盖住鬓角。他已经倾其所有穿在了身上御寒，毛线织的手套是露三个半截指头的——拇指、食指、中指——大概南方人为了便于数钱，此刻他冻得两手往袖口里互插、但南方人做的棉袍袖子很瘦的，手根本插不进去。他只好不时地把手放在嘴前“哈——哈——”呼上几次热气。伴着两只穿着布棉鞋的脚在雪地上踏出的节奏不断地叨咕着：“娘卖尻兴子，充军来了！”

啊，交关哪！冷来西！娘卖戾兴子，充军来了！……”

我爸爸见我一个劲儿地往爷爷的怀里偎，以便能暖和一点儿，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去找来接站的人，他又不好意思大声喊，自己又不认识去长影的路，急得团团转。有轨电车要到天亮以后才上班，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便决定雇马车，他从围在身前背后的几名老板中选了一位要价最低的，我们祖孙三人爬了上去。

新奇的交通工具、清脆的马铃声、陌生的冰雪世界，使我这个顽童一时间没了列车上哭着要妈妈的那一段情绪，兴奋地撩开车帘任寒风灌进脖颈，眯缝眼睛望着天上的星斗，倾听着奔马的喘息。不知不觉中便来到了地处郊外的电影厂大门口。

金灿灿的艳阳照着长影小白楼外边蓬松的雪地，仿佛在细碎的白银中掺进了无数粒金砂，在招待所的软床上只睡了半宿的我，精神已恢复如常。每天都是妈妈照顾我吃早点的，今天突然变成了食堂里的大师傅，幼童的心理也一下扭不过来。我一个人闷闷地在桌上嚼着馒头、咸菜，男女师傅们的议论全钻进了我的耳朵：

“这小孩儿谁家的？”

“听说是新来的艺术处长，北京调来的。”

“媳妇咋没一块来？”

“……听说好像是离了……”

“人家这个不愁找不着。过两天儿新的又续上了！”

“唉，可惜了这孩子了……”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可在我心里产生的回响却越来越大。

胡乱塞了几口馒头，我就噎噎噎地跑上了楼。

我急三火四地拿下脸盆架上印有招待所字样的白搪瓷盆，飞也似地跑出了小白楼的大门口。我选了一块干净的雪地用做雪人的地基，然后从四面往这里舀雪。小手冻得跟猫咬似的也不休息，仍旧呼哧带喘地一盆盆端着白雪。

不一会儿，我使用盆底和冻红的小手拍出了一个雪人的外形。我去伙房的煤堆上选了大小四块煤，分别把它们“安装”成了一双眼睛、一张嘴和一个鼻子。雪人直瞪瞪地瞅着进出招待所这条甬道。

我双手抱成一个虚拳在嘴前吹着气。尽管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把雪人生出来，但我希望它快些化了——化了妈妈就来了。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我的一颗幼稚的心坚信着。但是，雪人化了，化得一塌糊涂，化成了一滩水，在它自己的脚下和成了一滩稀泥，当然这里边还有我的泪水——妈妈她骗了我。这是我在冬天结束时得出的结论。

我们家在招待所住了一阵之后，搬到技师楼，我插班进了长影幼儿园。当时每星期六的晚上都要在厂大礼堂给家属孩子们放一场外国新影片，我看了两次以后便上了瘾，每到星期六下午就期待着家长来接。可是这一天傍晚，我们班上几十名小朋友陆陆续续全被家长接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沿墙摆成一圈的小凳子上，把脚跷起来看着我们班的老师孔宪英阿姨在擦那红红的地板。

“哇！——我要妈妈！”我再也忍不住委屈，号啕大哭起来。

“别哭了，十磅。”孔阿姨边擦地边安慰着我。

“呜——！我要看电影！……爸爸不要我了……爷爷也不要我了……呜！……”

“快别哭了！等一会儿我擦完了，我带你去还不行吗？”
我渐渐将号淘变成了呜咽，又把呜咽变成了抽泣，终于止住了哭泣。

孔阿姨收拾完了以后，为我洗干净那魂儿画似的脸谱，领着我走出了幼儿园的大门。

这是我第一次为失去母亲、被亲人遗忘而流下的泪水。因为我在有母亲的时候从未出过一次这种现象。

从此以后孔阿姨成了我的“业余妈妈”，每星期六都是她带着我去看电影，散场后再把我送回家去。

三十年后当我回到母亲身边来到天津时，我竟然在这里跟我慈母般的孔阿姨相遇了——她居然跟我的妻子在一个单位天津电影制片厂。老天爷真会安排，任何高明的剧作家恐怕也编不出这样的戏剧巧合来。

孔阿姨主动找到了我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地流泪。她使我回想起那不愿回忆的年代，那不可多得的慈爱、不求任何回报的无私的爱，给予了一个孤苦无靠的小生灵。这时我才知道，孔阿姨当年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头胎儿子，就为了全身心地照顾我们这些孩子，她忍痛把自己的亲生孩子送回了上海的婆家！——这新得知的一切更加令我感慨涕零、慨叹不已。在这人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还有这种人、这种精神吗？在我历经了人生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心灵和躯体上满布伤疤，这就更使我怀念那不值得怀念的岁月、那非常值得怀念的情感！（如今我在执笔写下这一段时仍忍不住热泪盈眶、涕泪横流。）我不禁要在肺腑的深处高呼一声：尊敬的孔宪英阿姨，我短暂而又久长的慈母！

1956年6月29日（农历五月十五日），我收到了一件预

示着将要改变我命运的生日礼物：用天蓝色平纹布自制的海军服。它的领子底下缝着一块白布，上面用红丝线歪歪扭扭地绣着字：“十磅六岁生日纪念王阿姨送”。这个王阿姨就是后来成了我继母的王彤阿姨。

有一天晚上我从幼儿园回来，爸爸不知是上班紧张还是创作劳累在沙发上瘫坐着抽烟。我打开了从北京带来的“莫期科人”牌的留声机，想安上一颗唱针听唱片。一不小心把手中的唱针盒弄撒了，短短的唱针撒了一地。我招呼爸爸帮我捡，可他不但不动弹，还发起了脾气，“哎呀，烦死人了，你都不知道爸爸一天开会有多累。”¹⁷

“呜呜呜呜……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不知是哪根神经触动了我，竟然从“唱针”一下子跳到了“妈妈”。我扑向爸爸的怀抱，硬拉着他的手要往外走，“上北京！……呜呜呜呜……找妈妈！……”

我看见爸爸的眼眶里也闪亮了，那是泪水的影子。看见它更激起了我的信心，使劲拉着爸爸往外走，仿佛“北京”就在屋外、“妈妈”就在隔壁似的。

“当当当当！”突然门被敲响了。

“进来。”爸爸说了一声，忙用手背蘸了蘸潮湿的眼睛。

我赶忙从他怀里跑开，又到刚才找唱针的那地方，蹲在地上假装捡起唱针来。

“这爷儿俩是干啥呢？”进来的是王阿姨。

“唱针。我捡唱针呢，捡我叔叔唱针！”我紧抹了一把眼泪，但没敢把脸冲着她说话而是盯着地面好像自言自语似的。

“这孩子真有意思！——管他叔叔叫唱针。”她用歌唱演说笑着。

“真的，不是说着玩儿，不信你问我爸，我叔叔就叫唱针！”